

外滩是无法绕过的上海地标

黄阿忠



远眺(油画) 黄阿忠

这道风景折射了当年房屋拥挤、公共设施缺失的城市状况。

外滩那个国际海员俱乐部,后来成了东风饭店,因为引进“肯德基”引起了全城轰动,则是80年后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。东风饭店边上,延安路高架桥有一个弧形弯,被称为“远东第一弯”,它与气象台擦肩而过,可以望黄浦江向东南远去。那个门口曾经竖过一块示意“华人一概不准入内”“犬不准入内”牌子的黄浦公园,现在建成了一块公共绿地,并矗立了一座代表这座城市的纪念碑,让外滩又多了一个不能忘却历史的标志。

那些连通外滩的主要地块现在都已经成了热闹繁华的街道,它们见证了历史,连接着文化。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就发生在离外滩不远的“三山会馆”;豫园是个园林,亭台楼阁、假山水榭,园内“点春堂”是“小刀会”起义的指挥中心。那些场所的存在,也可以说是外滩见证了黄浦的历史。

外滩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。少年时代仗着“水性”好,我从乍浦路桥跳下苏州河,或从那个标志性建筑“气象台”下水游黄浦江,有多少次躲避漩涡,躲避大轮船螺旋桨的引力,顺水游到浦东。后来上山下乡去农场,常去十六铺码头乘双体客轮往返。站在农场那片盐碱地上,脑海里则是挥之不去的外滩景象。

我曾在外滩写生,画那条东去的黄浦江,江中的帆船、运货的小白船,耳边万吨轮的鸣笛声此起彼伏;我曾登上海关的钟楼,俯视画汇丰银行白色的圆顶,听它敲响《东方红》的音符。我背着画夹,脚步慢慢,走到外滩后街,四川路、江西路、九江路,那里到处留下我流淌的汗水和足迹。外滩的街道、建筑、色彩养育了我。

我曾组织过上海油画家以及全国的油画家,集中一起描绘外滩的建筑,从华尔道夫到百老汇的油画聚会,叙述着一个又一个和外滩建筑有关的故事。百年的交响,歌唱一曲又一曲心灵的旋律。

那天在雨中,我撑着伞走到了黄浦江边,望着两岸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;黄浦江水悠悠东流,和浦东三件套对望着讲两岸的故事。我们在灯火中可以回忆,可以想象;我们在故事中可以联想、可以展望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外滩踩着历史的节拍,更时尚、更现代了。黄浦江防汛堤抬高,筑成平台,可以看得远;外白渡桥整修移动装架,更牢固了;南京路步行街人群熙熙攘攘,聚集人气;气象台粉刷一新,旧貌换新颜。

外滩没有变,每幢大楼的灯光仿佛还在呼吸,扬眉吐气。

外滩灵魂永存,也是绕不过去、永远不变的上海地标。

仍称戴震“学通天”,足见其胸次。戴震去世后,还是钱大昕为其作《戴先生震传》,推彰其学术成就不遗余力。其为人之古道相助,绝非断断不休于学术虚誉者能望项背。

钱大昕、戴震二人虽派别不同,却一向秉持相互欣赏的君子之风。然戴震生前提及钱大昕时,一句“当代学者,吾以晚微(钱大昕字)为第二人”(出处为学者江藩的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)颇令后人玩味。这等于说戴震俨然以第一人自居,把学识渊博且有恩于己的钱大昕排在次席,后来一些学者多为钱大昕鸣不平,称此举为“戴震式的自负”。

对此事应取何视角呢?在下不才,却愿抛砖引玉:首先,戴震确为乾嘉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,时人称为“经学大儒”。梁启超曾言:“苟无戴震,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,盖未可知也。”把钱大昕排在仅次于自己的位置,好像不够谦虚,其实以戴震的学术成就,这样的评价,已表明对钱大昕的尊重、认可和肯定了。其次,戴震这么排,显然也摆明不想虚词矫饰,堕入人情世故的俗套。

游思

学人的「争」与「不争」

喻军

学术乃天下公器,不是酒桌上的轮流坐庄,就事、为学、论人应以公允严谨为尺。有人说钱大昕情怀淡泊,远超戴震,虽不失为一种评判方式,却也符合其底层逻辑,所以我们也心悦诚服地表示认同,然回顾当年钱大昕听戴震此言后,未予任何计较,或者说未作任何反应,反倒对戴震的学问愈加佩服,就显出恢恢的气度来了。他曾告诫弟子“读书为上,闲游无益”,要心无旁骛,专注于学问本身。戴震走后,钱大昕没有“翻案”,仍以戴震倡导的“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,由训诂以寻义理”为治学宗旨,且在笈学、道德伦理学及社会政治思想层面,颇受戴震影响,且甘愿为戴震学说担负起阐释者的角色。如此光风霁月,我想与钱大昕曾受教于吴派开派宗师惠栋,感其气度雍容、沉潜笃实和认知清醒有关。想起梁任公所言:“登高山复有高山,出瀛海复有瀛海。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今,所成就其能几何。”钱大昕自然明白:人的能力再大,也是很有局限的,何必非得争个独占鳌头的虚名?故其从无“既生瑜,何生亮”这般的庸人自扰。另外,看得出他很重友谊,与戴震惺惺相惜,不想因此事产生裂痕,输了风度。

能做到钱大昕这样当然很不易,这里,我们不妨再举一例作为反衬,事主的学术地位虽但不逊色于钱、戴,甚而过之。朱熹、陆九渊分别为宋代理学和心学大师,前者致力于通过格物致知阐明万物事理,正所谓“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”;后者则以为“心即理”,真理只须向内求而不假外物。由于观点对立,分歧很深,当年的学界领袖吕祖谦设局组织了一次“交流会”,以期调和两派观点。辩论在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,史称“鹅湖之辩”。具体过程不赘述了,总之一言咄咄逼人,一个据理力争。陆九渊攻击朱熹的治学“支离破碎”“唯我独尊”;朱熹一开始想克制,但被陆九渊当头棒喝,也就不管不顾,“气场全开”,对陆九渊的“流于空疏”和“切己自反”多有指摘,最后闹得不欢而散。谁曾想事情过去后,两位大师并未交恶,甚至还有接触,彼此的门生却不依不饶,将这场辩论升级为“门户之见”,开启了后世八百余年的“朱陆异同”之争。明王阳明亦介入其中,最终形成与“程朱理学”分道扬镳的“陆王心学”。

这样的辩论于学术进步未必不利,然而在情绪支配下难免“技术走样”,沦为意气之争。例子还有很多,这里一笔带过:比如为争夺修史独家署名权、文坛盟主地位、学派正统、学术话语权,甚至仅为宴席上的座次排列而心生怨艾,导致失和的事古常有之。我们可以设想,倘若钱大昕、戴震为“学派正统”“宴席座次”而争将起来,连带门生和“鸣不平者”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,所谓“渊和和睦”“有容乃大”自然碎了一地,“形象塌方”也在所难免。钱大昕的胸襟器识,竟悄无声息地止住了这种“变盘”的可能,也于无形中维护了彼此的形象。这是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吗?非也!钱大昕知道,“大谋”者,历史也。人终究是渺小的,人生在世只须尽自己的本分,做认定的事,至于结果,不妨交给“未知”。

总括而言,两位大师的交往,属“文人相重”的特例。只不过这个“重”字,未必表现得如诗人(李杜、王孟、元白等)那般流光溢彩、引人注目,亦非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、生死知音般传奇。然对于钱大昕、戴震两位大学者,与其非得分出个孰一孰二,是丹非素,莫如说钱大昕之所为,恰好印证了“水流不争,而泽被万物”的至理。惟其不争,反成其大。后来陈寅恪称誉钱大昕为“清代史家第一人”;还有人把钱大昕称作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,将其比作汉廷经师荀宏以来“第一人”……你看,钱大昕不争第一,“第一”却如清风飒然而至,接踵而来,不亦妙乎?

一

我曾在文中多次提到“文人相轻”的陋习,说这是一种使气耍嘴和不够亮堂的小我格局。当然我也写过古来文人相重的事例,认为这是一种渊雅高华的人格气象。这里要提及清朝两位学术宗师钱大昕和戴震,他俩分属乾嘉“吴”“皖”学派。之所以拿他们说话,是觉得二人间的交往尤显特别。

曾冒酷暑去过一趟嘉定老城,横沥与练祁交汇口有钱大昕故居“潜研堂”,因其自号“潜研老人”,故得此名。这是一座风格简朴、依河而建的徽式建筑。门前有座精美的亭子,置于沿河护栏前。故居面积不大,砖木结构,有小天井和两层楼房,往西还有几间平房,和江南清代民居别无二致。当然作为“浓缩版”,大抵仅为故宅之一角。前厅悬一牌匾,上为钱大昕自书的“诗礼传家”。主厅介绍钱大昕学术成就、生平及乾嘉学派的学术脉络。

钱大昕47岁因父丧丁忧回乡,便称病卸篆,于“潜研堂”定居,潜心著述,集30年之功,完成多部著作。他还出面主持了钟山、娄东、紫阳等书院。可惜他目力渐衰,常认不出访客何人,用餐亦须家人夹菜。乾嘉学者中多人近首,如顾炎武、余萧客、王鸣盛、章学诚等。戴震也不例外,“观书几与面磨”,这大抵是训诂、考据学人做学问过于用力,外加灯油质量不佳落下的后遗症。

同年秋,我游黄山,一边云海观松,一边惦记着屯溪市区的戴震故居。可惜无法抽身,下山后即赴江西婺源而去。好在婺源有个江湾古镇,镇子里有朴学大师江永的故居。他身上还有一层光环:戴震的老师。因公认戴震为皖派创始人,故人称江永为皖派“奠基人”。过访江永故居,我看得很仔细,可算是对未能“访戴”的弥补。

钱大昕、戴震二人,前者为文史考据学家,在史学、音韵、训诂诸方面成就卓著。王昶、段玉裁、王引之、凌廷堪、阮元、江藩等一流学者均给予钱氏极高评价。戴震则为思想家及考据学家,和钱大昕同时代,且相熟。

近代以来的学者多把戴震置于钱大昕之前,认为戴震的学术地位更突出。自然也有不同意见,如吴派学者江藩即认为“东原(戴震字)之学,以肆经为宗,不读汉以后书,若先生(指钱大昕)学究天人,博综群籍,自开国以来,蔚然一代儒宗也”。这里要稍作解释,“不读汉以后书”所指的“汉学”,即研究于汉民族有关的经史、名物、训诂考据之学,衍及小学、音韵、天算、水地、典章制度、金石、校勘、辑佚等学术。其治学根本在于实事求是,无征不信。

戴震二十几岁便开始著书立说,凡书一出,即被人叹为“奇书”。但他性介物忤,32岁时为躲避地方官府加害,只身北上,后断续十余年居于京城。穷愁却不潦倒,被人目为狂生。他从未自伤不遇,却有那么点“自负天才”。钱大昕当时也在北京,考中了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,后出任翰林院编修、詹事府少詹事(正四品)、提督广东学政等职。

二

某日,钱大昕在寓所接待了身穿破棉袄、带着书稿求见的落魄秀才戴震。二人一整天纵论学问,语多投契,戴震离去时,钱大昕毫不吝嗇地赞其为“天下奇才也”。第二日,爱才如命、一腔热忱的钱大昕向礼部侍郎秦蕙田推荐戴震之学,秦当即与钱大昕一同坐车访戴,探讨学术问题,秦蕙田亦表叹服之情。这还不算,钱大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,又在朝廷要员和纪晓岚、朱筠、王鸣盛等一班进士中推荐戴震,使之声名鹊起,一时名流高官纷纷与之结交。这些人未因戴震出身寒微、没考上进士而对他人有所怠慢。因为他们心里清楚,学问高低并不取决于一纸八股文,真才实学才是检验的绳尺。秦蕙田与戴震论学后,便把戴震接到家中,让其与新科进士王昶一同编书,共事五月而别。纪晓岚也请戴震当家庭教师,一千近10年。他认真拜读了戴震《考工记图》的书稿,钦佩其学养之深,常以高人之礼待之。还为囊中羞涩的戴震出资刊印著作,作序加以推崇。戴震在纪晓岚家中,利用教书的空隙,又一连写了多部著作。

戴震在纪府期间,桐城派大师姚鼐因仰慕其学识,修书一封请予拜师,被学界传为美谈。后朝廷开四库馆,蒙总督官纪晓岚的举荐,戴震才以秀才身份破格入馆修书,担任纂修一职,生计遂有着落。戴、纪二人交情很深,以至戴震死后多年,纪晓岚仍写诗予以缅怀,仅录一首如下:“披肝露胆两无疑,情话分明忆旧时。宦海浮沉头欲白,更无人似此痴痴。”

所有这一切,固有戴震深厚的学养作为根基,然其声名未彰之时,钱大昕一力荐刻,补厚待之,引众口翕然以至名满京城学术圈,堪称挖井栽树之功。戴学声誉鹊起之时,钱大昕不计身份高低,

上海·上海

从百老汇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厦,跨过架在苏州河上的那座百年铁架桥——外白渡桥,就是名扬四海的外滩。山到成名毕竟高,黄浦江畔那一幢幢形式不同、风格各异的大楼,成就了远东的建筑博览。几乎每一座房子都藏着饶有趣味的故事,穿越时代和历史,交响百年。

外滩,留下了50后、60后共同的记忆,那是上海绕不过去的坐标。也许大家还记得,一度风靡全国的、印有“上海大厦搭配外白渡桥”“海关钟楼挨着汇丰圆顶建筑”图案的老式旅行包。若是走亲访友、出差时,总会出现它的踪影。如果拍摄上世纪60年代城市生活故事的电影,导演大多会让男主角拎上这两款时代感满满的“旅行包”。

想起了半个世纪前农场的生产劳动。在棉花地里锄草是大田里

最轻松的活,可以一边锄草、一边聊天消磨时间,排遣那种单调、重复、枯燥的农田作业。

我们在锄草时,玩城市商店、场所接龙游戏,你说一个店名,我接一个场所,或他说一幢建筑,从南京西路静安寺开始,自行车车行、亨得利钟表店、培罗蒙西服店、王家沙、南京理发店、国际饭店、少儿书店、航模店、咖啡店、人民公园、永安公司、第一医药商店、朵云轩、邵万生糟货店、南京东路新华书店、外滩,然后左转和平饭店、右转弯气象台……差不多不会有遗漏。我如果接不上,旁边的人会上来,你若忘了那个店名,他会随口补上。说着说着,有人竟掉下了眼泪,空气中弥漫着思乡之情。这些接龙的商店、建筑、街道,是对南京路、外滩的集体记忆,是对生我养我的城市的思念,是对这座城市的情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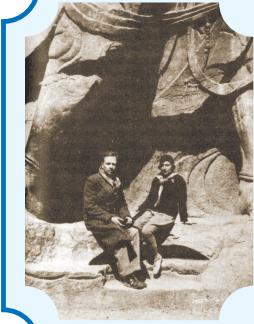
曾记否,外滩的黄浦江防汛墙前挤满了一对对紧挨着的青年男女,那是上海奇特的谈恋爱场面,也是一道历史记忆的风景线。

匈奴未灭,何以家为

金岳霖讲完沈懿嫫的故事,费正清似乎还沉浸在那悲伤的情节里。联大几位老朋友曾对费正清说过,联大有多少人,便有多少故事。这时,从楼梯传来一阵窸窣的皮鞋声,来人刚从门外探进头,就是一声“哈呀”。原来是那个“半拉子”中国人陈福田。

他一见费正清,就叫起来:“约翰,真没想到你有空光临寒舍!”说罢,他把双手提的行李放下,伸手往一个旅行袋里直摸,终于掏出一听罐装香烟,马上打开,递给费正清和金岳霖各一根。费正清拿在手中,并不点火。那时,上等烟在昆明难以到手,顿时满室香烟缭绕,香气四溢。陈福田刚从夏威夷檀香山回来,他高兴地对金岳霖说: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你打听的那个人有下落了,是在旧金山。”金岳霖听罢喜出望外,伸出大拇指说:“福田啊,你真有办法,功德无量!”

原来,当时联大学生的生活十分困难,连饭都吃不饱,就别提穿的了,特别是那些从沦陷区来的学生,更是如此。联大许多学生都在外面兼差。有的在中小学兼课,那工作正好对口,合适。但到那里兼课的许多是教授,甚至是名教授,僧多粥少,教职有限,学生不易被聘。于是,干什么的都有,五花八门,形形色色,不一而足。有的学生到商店当营业员或收款员,有的摆摊修电器,有的女学生兼职当保姆,还有的学生到邮局兼职当邮差,有的甚至在城楼下放炮,当时昆明比较落后,许多人家没有时钟,由军队在城楼上按时辰放



中国情缘

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

陈宇 著

炮报时。但兵士做事马虎,时常错报误事。学生纪律性强,工作负责,就改由学生去干,拿点津贴。那时昆明驻有许多美军,还有驻昆明外籍人员,懂外语的学生就给他们当翻译。有的晚上到电影院做同声翻译。因为那时影片稀缺,只好放些外国老掉牙的故事片或纪录片,一边放一边由学生介绍剧情或内容。还有一些经济实在困难又找不到兼职的学生,干脆休学到外地打工,赚点钱后再回校读书。

对于学生经济上的困窘,金岳霖看在眼里,惦记在心,很希望有机会能帮上一把。刚好他有个湖南同乡在昆明经商,生意做得不错,但生意人踪不定,眼下不知在哪里,如今却被陈福田找到了。金岳霖高兴得不行了,他想借清华定期的学术假到美国做研究和讲学,借此机会募捐10万美金回来,以解师生燃眉之急。

金岳霖自从认识了沈懿嫫后,就经常通过她了解那些经济最困难的学生,以便接济。渐渐地,两人也更加熟悉起来,交谈中为了表达敬意,汉语、英语甚至湖南土话齐上阵。

其时,昆明唐家花园颇引人瞩目,因为那里住着联大名教授。清华“三孙”的“两孙”就住在这里,且居于同一斗室。这“两孙”仪表堂堂,才貌不凡,绅士风度十足,却都是单身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陈岱孙正面遇到了自己独身的原由。那是缘于一台戏的演出。

联大学生社团活动十分活跃,特别是联大剧社,影响更广。当时他们曾演出过一台话剧,叫《祖国》。它改编自德国著名剧作家沃尔夫的一部反法西斯作品《马门教授》。改编者是联大教授陈昆。话剧讲述日军占领下的某城,一位爱国教授不顾个人安危,与学生、工人一起跟侵略者和汉奸进行坚决斗争,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。担任舞美设计的是闻一多先生。由于这台戏涉及知识分子面对侵略战争的立场态度与政治取向问题,宣传了为祖国抗战不畏牺牲的精神,跟时局和民众思想十分合拍,公演后反响强烈,引起社会极大的共鸣,轰动一时。话剧《祖国》的演出,是联大爱国热情和师生大合作的硕果,备受赞誉。在一次演出幕间休息时,几位教授到后台看望慰问演职人

员,其中就有陈岱孙。彼时彼刻,由于剧情跟师生感情息息相关,气氛融洽,师生间交谈十分随意,一扫平时的拘谨。有个学生想起昔日同学间对独身教授的种种议论与猜测,一时兴起,突发奇想,竟贸然问陈岱孙:“敢问先生,为何至今还没结婚?”此语一出,后台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陈岱孙的身上。众人都屏息静候,想听陈岱孙究竟如何回应。只见平日学生心目中颇为严肃又带几分傲气的陈岱孙仰起了头,双臂叉抱胸前,望着天花板,神情凝重,久久不语。那个发问的学生顿时发窘,后悔自己的唐突,有点手足无措。但见陈岱孙的目光从天花板上慢慢地收了回来,环视一下布景和演员们,非常郑重地回答了八个字:“匈奴未灭,何以——家为?”霎时间,四周鸦雀无声,听者无不肃然起敬。

跟陈岱孙相比,金岳霖的单身原因早年就在清华园广为流传——他始终深爱着林徽因。对此,沈懿嫫也听得很多。在昆明时,梁思成夫妇住郊外的龙头村,住处还特地给金岳霖留了个房间,供金岳霖上课或放假时去住。梁思成不时要去外地进行野外古建调查,就请金岳霖照顾体弱多病的林徽因。金岳霖对林徽因呵护得无微不至。林徽因患有严重肺病,咳得厉害。据传,有时半夜发作,金岳霖不便进入室内,就坐在卧室门口静候,听辨咳嗽声好转后才回房睡觉。沈懿嫫与金岳霖更熟以后,谈话也比较大胆一些,有一次婉转问及此事。金岳霖回答,确是如此,因为看不到林徽因的病床,放心不下,就听声音。进而解释道:“懿嫫啊,你不知道不知道,声音是一种介质,介质是一种中介物,它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,我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她的病情了。”

(三十八)

连载

解 放 日 报 连 载 广 告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98